

歷史與空間

左文

與總理的「忘年之交」

任繼愈先生印象



任繼愈 網上圖片

任繼愈(1916年4月15日至2009年7月11日)，中國著名哲學家、佛學家、歷史學家、國家圖書館館長、名譽館長。2009年1月16日，92歲高齡的中國國家圖書館名譽館長任繼愈先生，和香港著名學者饒宗頤等五位先生一道被溫家寶總理聘為中央文史研究館館員，在得知這一消息後，任老十分高興，並鄭重表示：一定要為弘揚中華文化盡自己最大的力量。孰料不到半年，2009年7月11日，任老就悄然離世。當天上午，時任總理溫家寶當即委託辦公室工作人員給相關負責人打電話，轉達他對任老辭世的深切哀悼，並向任老的親屬表示慰問。任老與溫家寶總理的交情由來已久，這種交情建立在對中華文化命運的共同關注之上。溫總理與任老的年齡相差四分之一個世紀，是名副其實的忘年之交。溫總理對任老始終深懷敬意，任老也將總理視為知己，多次贈書、致信，就重點文化工程建設、教育改革等建言獻策，而溫總理總是認真閱讀，及時覆信。2004年8月，傾注了任老大量心血的《大中華文庫》出版了第一批圖書24種52冊。該文庫是我國歷史上首次系統全面地向世界推出的中國古籍整理和翻譯的巨大文化工程，選收了歷代以來百餘部經典著作，由古漢語譯成白話文，再由白話文譯成英文。任繼愈先生代表文庫工作委員會將第一批書送給溫家寶，請總理「在百忙之中審閱，並請提出指導性意見，以便於我們今後更好地開展此項工作。」溫總理隨即回信：「謹對您及從事這項浩繁工程的各出版單位和全體工作人員表示衷心的感謝和熱烈的祝賀。這部巨著的出版是弘揚中華民族優秀文化的有益實踐和具體體現，對傳播中國文化，促進世界文化交流與合作具有重大而深遠的意義。這部文庫翻譯和出版質量之高，反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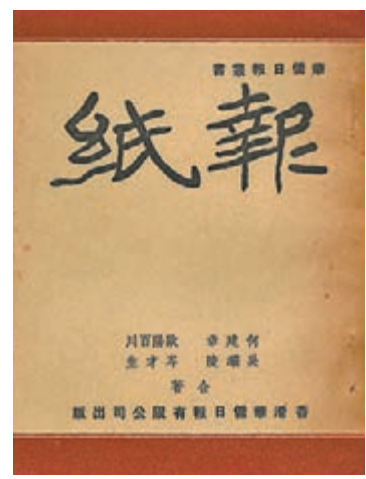
了我國的出版水平。」「我國有著悠久而燦爛的歷史文化，希望你以偉大的愛國熱忱、寬廣的世界眼光和嚴謹的科學態度，鏗而不捨地把這項光輝的事業進行到底。我堅信你們一定能夠做到，也期待看到你們新的成果。」2009年溫總理在參訪西班牙塞萬提斯學院時，將《大中華文庫》作為國禮饋贈校方，可見文庫在總理心中的分量，同時也體現出總理對以任老等人辛勤勞動的高度肯定。任老主持的另一個文化大工程——《中華大藏經》也得益於他與溫總理的「文化交情」。自1987年擔任國家圖書館館長後，任老即積極倡議，以館藏的《趙城金藏》為基礎編輯《中華大藏經》，終獲批准立項。經過16年努力，107卷、1.2億字的《中華大藏經(漢文部分)·正編》編纂完成。之後，任老又組織力量整理編纂《中華大藏經(漢文部分)·續編》，預計五年內完成2.6億字的點校編纂任務。由於規模龐大，所費甚多，進展比較緩慢。2007年，任老致信溫家寶總理請求幫助，溫家寶很快就作出批示，明確要求財政部予以支持，從而使得此項工程得以順利推進。同樣是在上世紀80年代末，數百名中國學者發起編纂全面展示浩瀚中華文化、總規模超過7億字的類書《中華大典》，由任老擔任主編。2004年3月18日，任老和幾位專家聯名給溫總理寫信，將《中華大典》的編纂意義予以說明，將遇到的困難告訴總理。溫總理又一次及時覆信予以重視和支持，中央財政為此撥出專款2億元，原本因為經費短缺的《中華大典》工程再次啟動，並擴大規模，將原來21個典擴大成24個典。2007年9月17日，有關部門受溫家寶總理委托看望任繼愈先生，送上花籃，致以親切的問候。任老覺得「盛情關懷，無以回報」，於是就教育問題向總理建言獻策。因為他覺得「我國教育面臨危機」，並「常為此長夜不眠」。他認為中國的教育主要存在三個方面的問題：一是缺乏做人的教育，二是缺乏傳統歷史的愛國教育，三是缺乏創造力的教育，可謂一針見血。溫總理在覆信中說：「您對我國教育事業十分關心，所提意見中肯，給人以啟示。十七大報告已有教育方面的內容，會後國務院還將就教育問題進行專門討論，當認真吸收您的意見。」時隔一年多，我國開始制訂《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通過各種方式徵求了社會各界意見210多萬條，其中就吸收和採納了任老所提的有關意見。2009年5月中旬，得知任繼愈先生生病住院，溫總理專門委託國務院參事室主任陳進玉同志和中央文史研究館館長袁行霈先生專程前往北京醫院探望。7月11日，獲悉任繼愈先生去世後，溫家寶總理心情十分沉重。當天下午5時左右，總理親自打電話給國務院參事室負責人，他指出，參事室、文史館還有一批年事已高、德高望重的老先生，一定要把他們照顧好。時光回轉到2008年，當溫家寶總理得知任老雖年過九旬，但仍關心中央文史館工作後，明確表示要聘請任老為文史館館員。溫總理說，文化的發展和繁榮，關鍵在人才，在一大批領軍人物。文史館有敬老崇文的傳統，像任繼愈老先生這樣在國內外有重要影響的文化界代表人物，年齡大一點不要緊，吸收他們作館員，有利於充分發揮他們在推進國家文化建設中的獨特作用。一位矢志不移以振興中華文化為己任的大學者，一位視文化傳統為國家靈魂的共和國總理，以文化為媒，就這樣演繹了一段墨香四溢的忘年交佳話。我們有理由相信，中華文化之燈必定會點得更亮，傳得更久遠。

字裡行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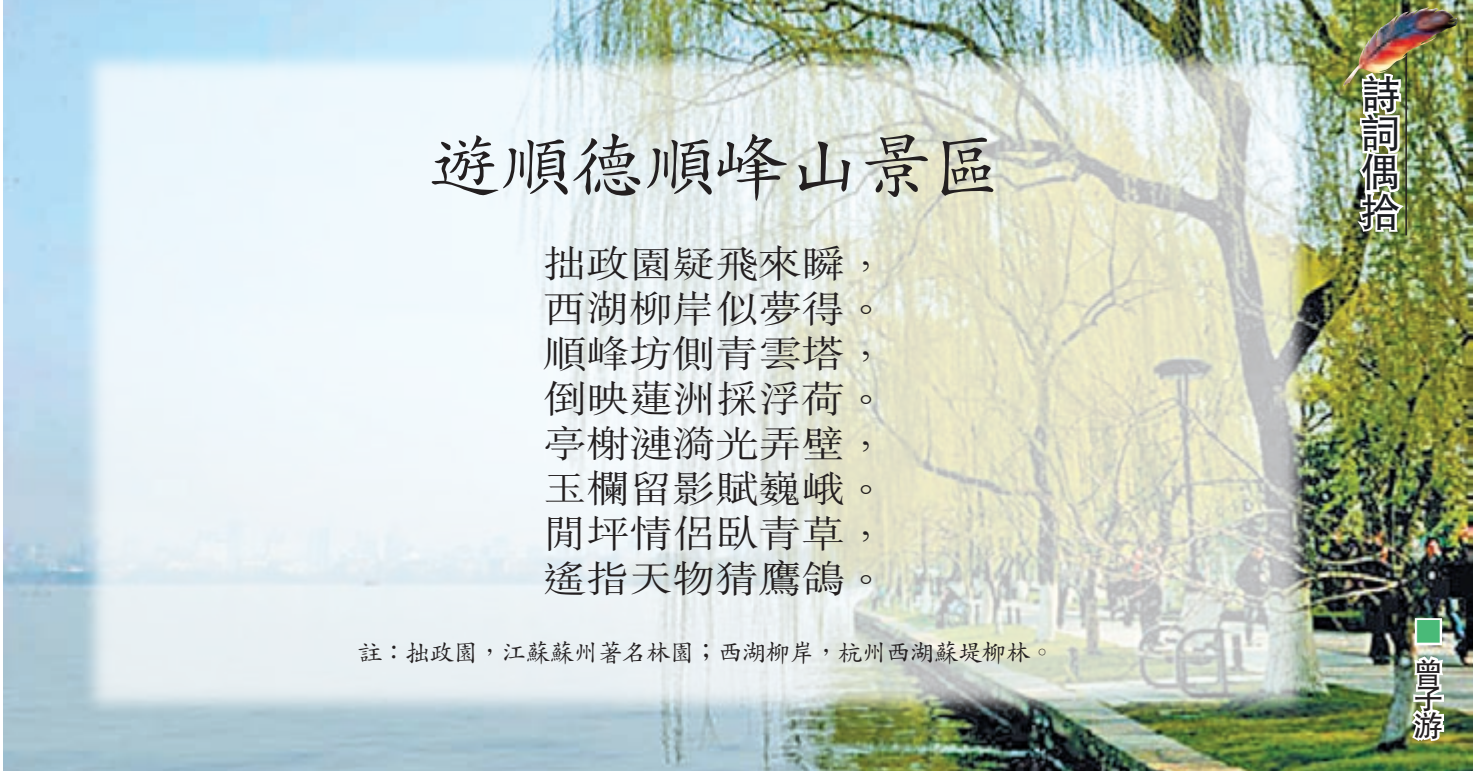
黃仲鳴

岑才生與報業

前《華僑日報》老副岑才生以九十四歲高齡，於4月27日早上逝世。聞者惜之，我更是黯然。19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我曾在《華僑日報》兼職。這「兼職」實是怪得很，不用上班，也非報社職員，而是以包版的形式為《華僑》編半版副刊。那時版名曰「群英會」，其意是招領各方英雄來耕耘；可惜，才哥(那時我們這樣稱呼岑才生先生，雖然他年長我們很多)對財是相當緊手的，包版是給一筆錢，由主編自行分配，包括稿費和編輯費，製作則由《華僑》負責。包版費不高，自是請不到「真·英雄」助陣，但也搞得有聲有色。直到《華僑》轉讓《南華早報》，那才壽終正寢。記憶中，每日的黃昏，我都跑上《華僑》發稿和編稿，逗留一至兩小時。有時得遇才哥，都寒暄幾句。我曾多番請他為「群英會」提點意見，他總是笑吟吟：「不錯啦。編輯自主，你鍾意點搞就點搞。」這就是才哥的本色。這「本色」其實害了他。《華僑》晚近幾年，就是在他的「編輯自主」下，同日一張報紙，同一篇稿稿每見於不同版面，才哥居然不炒魷、不責怪、不整頓。《華僑》質素，自是每況愈下。才哥太好人了。這是華僑人的評價。當年每上《華僑》編輯部，都感受到一片平和，一片輕鬆的氣氛。我坐在其中，變得十分慵懶，十分的舒適。我是頗懷念那段日子的。有人說，才哥太子爺出身，秉承父親岑維休的產業，是不懂辦報的，他只是老闆，不是報人。這說錯了，才哥是真正的報人。才哥留學美國，讀經濟學，得碩士。1945年入《華僑》營業部，從低做起；1954年後任日報編輯；1957年出任經理；1985年任總經理。到1986年父親離世，才接任社長。才哥歷經營營業部、編輯部，對報紙的運作了如指掌，這可見於1955年出版的一部名曰《報紙》的書，封面作者署何建章、歐陽百川、吳瀾陵、岑才生。內容其實多由岑才生執筆，何建章是當時日報的總編輯，歐陽百川和吳瀾陵是編輯。吳瀾陵開篇寫《報紙之史的演進》，佔三頁；何建章寫第三章〈畧論記者工作與修養〉，佔兩頁；歐陽百川寫第四章〈編輯工作概述〉，佔兩頁，都是篇幅甚短之作。其餘四章〈香港報紙的組織〉、〈報紙出版程序〉、〈什麼是新聞〉、〈怎樣讀報〉的長文，都由才哥執筆。從這幾章可以看到當時報紙的面貌，插圖亦多。在印製技術開始躍飛的上世紀90年代，這部描述傳統報館運作的《報紙》，實在是一部史書。吳瀾陵說：「今日(按：指50年代)香港報紙仍在一切現代的優越條件下邁進，其理論與實際，可從這部《報紙》窺其全貌，因為作者岑才生不但是新聞學的研究者，並且負起了搞好一張報紙的實務，其深入淺出的寫法，大有助於讀者對於報紙的了解。」確然。才哥去矣。他是我從事報業以來「最仁慈的老闆」。



《報紙》 作者提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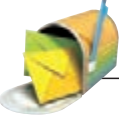
遊順德順峰山景區

拙政園疑飛來瞬，
西湖柳岸似夢得。
順峰坊側青雲塔，
倒映蓮洲採浮荷。
亭榭漣漪光弄壁，
玉欄留影賦巍峨。
閒坪情侶臥青草，
遙指天物猜鷹鷂。

註：拙政園，江蘇蘇州著名林園；西湖柳岸，杭州西湖蘇堤柳林。

詩詞偶拾

曾子游



來鴻

周軒浩

《文匯》文人在達德

筆者年前參觀香港《文匯報》報史館時，除了被靠近展廳大門的「文匯報」、「文以載道 匯則興邦」這十個映入眼簾的大字和一系列璀璨奪目的文物、展品所吸引外，亦對展板上介紹的芸芸「開報元老」及「猛料員工」印象深刻，他們包括：首任董事長李濟深(著名軍事家、前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前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前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主席)，首任總主筆徐鑄成(曾任上海《文匯報》社長，首任總經理嚴慶禮(上海《文匯報》創始人)，首任總編輯唐納(著名演員、曾任上海《文匯報》總編輯，首任副總編輯(著名電影理論家、曾任上海《文匯報》副社長)，首任編委會委員胡繩(前中國社科院院長、前全國政協副主席)，文藝周刊主編茅盾(著名文學家、前中國文化部長)，香港《文匯報》旗下的新思潮周刊主編郭沫若(著名詩人、前中國科學院院長)，新思潮周刊主編侯外廬(著名思想家、前西北大學校長)，經濟周刊主編千家駒(著名經濟學家、前中國科學院院士)，史地周刊主編翦伯贊(著名歷史學家、前北大副校長)，科學生活周刊主編曾昭倫(著名科學家、前中國教育部副部長)，青年周刊主編宋雲彬(著名文史學者、前浙江省文史館館長)和教育周刊主編孫超孟(著名教育家、前全國工商聯副主席)等等。可見創刊於1948年9月9日的香港《文匯報》在「建報」初期可謂大師雲集、星光熠熠；而在上述幾位才高八斗的《文匯》文人當中，曾經歷香港達德學院扯上關係的便有李濟深、胡繩、茅盾、郭沫若、侯外廬、千家駒、翦伯贊、曾昭倫及宋雲彬九人。坐落於新界屯門青山的達德學院，今年10月將迎來建校70周年紀念。事緣70年前，即1946年6月，國民黨軍隊與中共解放區發起進攻，大規模的內戰一觸即發。內地一些作家、藝術家、哲學家、教育家、詩人、記者和民主黨派人士，為免遭到戰火蹂躪，遂紛紛南下香江。當時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周恩來和中共中央黨校校長董必武，便指示中共廣東區書記尹林平以及滯留香港的左翼民主人士在香港設立一所全日制、四年制的文科大學，藉以安頓這批南來名人，同時培育年輕學子為即將新生的共和國效力。同年9月，達德學院董事會推舉李濟深為董事長，並聘

生活點滴

馮磊

白鹿原上的呻喚

作家陳忠實走了。他去世的時候，只有七十三歲。按照傳統的說法，「七十三，八十四」，叫做「旬頭」。據說，孔子只活了七十三歲，而孟子則活了八十四歲。現實生活中，國人身上似乎確實存在這麼一個生物鐘，它就像一道咒語，又分明是一道刻痕，時刻提醒你生命長度的有限。對孔孟而言是這樣，對其他很多人而言也是如此。對一個作家來講，七十多歲就離開未免太可惜了。有文友在朋友圈裡議論說，「大家要練好身體，爭取寫得更長。」她的話，也曾引發了大家幾分感慨。上世紀九十年代，陝西作家群是一個閃亮的字眼。以賈平凹、陳忠實為領軍人物的陝西作家隊伍，幾乎每年都有沉甸甸的收穫。他們的作品，不僅數量上頗為可觀，在寫法上的突破也令人側目。1990年代後期，內地下崗潮興起，我所在的小縣城裡，到處都是下崗工人的書攤。這些書攤所售賣的，其實都是盜版書。時隔近二十年，我仍然記得那些被盜版作品的書名：《廢都》、《白鹿原》、《驢子》……在我的記憶裡，其中近一半都是陝西作家的作品。陝西作家厚重，陝西作家文筆樸實，陝西作家喜歡寫黃土坡上發生的故事。《白鹿原》問世以後，有無數人讀過這部作品。除了一次次再版，更有無數的書商為了利潤盜印這本書。其間，這本書更經歷了修改與刪減，就像一個在舞台上演出的演員，中場一次次去補妝那樣。我想，對於一本小說而言，對於一本書來講，這當然是一種褒獎。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命運，一本書也是如此。古往今來，有多少作品經歷過刪減、盜刻與毀版？《白鹿原》憑借自己獨特的藝術特色被大家認可，尤其是被盜版商認可，這是很有趣的事情。陳忠實出生於1940年代，他們那一代人的經歷堪稱坎坷。他們在襁褓之中經歷了抗日戰爭，童年時代經歷了解放戰爭。再後來，他們少年時代經歷過饑饉，然後還有其他諸多的波折不斷。據說，作家閻連科曾是一位地道的農民，他在《我與父輩》一書中說，自己因為一個難得的機遇，得到一份在礦山工作的活兒。此後，

「每天雙班，一口氣幹十六個小時，整整四十一天沒有下山」。如此繁重的勞動令人望而生畏，但對閻連科來講，卻是必須珍惜的機緣，否則他就得回家種地。有一次，他看到作家張抗抗的一本書，從書的封皮上得知，張因為為了這部小說從此脫離了北大荒而留在哈爾濱。受到啟發的閻連科於是發奮寫作，多年後終於走出農村。閻連科是比陳忠實晚一代的作家。陳忠實的境遇或許比他好一些，因為陳曾經是一名基層幹部，但是陳似乎也沒有少受命運的擺佈。據說，陳忠實回家發奮寫《白鹿原》，數年後終於完稿，他抱着一大堆稿紙對妻子說，這本稿子如果成功，就可以進城住樓房；否則，就做好在鄉下呆一輩子的打算吧——這段文字，不知是否真實。這段文字裡所講的故事，分明有一絲悲壯的色彩。閻連科和陳忠實如此，馬爾克斯的境遇也好不到哪裡去。談到《百年孤獨》，馬爾克斯回憶說，「那時我每天都寫作，甚至星期日也寫，從早上9點寫到下午3點……每天工作的時間中，我吸40支香煙，其他時間我盡量不讓香煙毒害自己了」。在長達18個月的寫作期間，馬爾克斯不知妻子是如何籌款維持生計的。當寫到一半，他給妻子的5,000美元已花光，只好當了汽車……1940年代出生的作家，很多都是苦難兒的。困難，或者說苦難成就了他們的名聲。但，真正使他們得到這一切的，其實還是對人性卓越的洞察力。有評論家說，陳忠實的文字，無情地撕去遮掩在傳統社會身上虛偽的外衣。讓很多人、很多角色極不舒服：對一輩子「娶了七個老婆」的白嘉軒而言如此，對鹿子霖而言如此，對無數後來人而言更是如此。長篇小說《白鹿原》中，曾一再出現「呻喚」一詞。這個詞多次出現在田小娥交歡的呻吟聲裡，也出現在其他場景裡。這是一個讓人感慨的詞語，它包含着生活的酸甜苦辣。有慾望在湧動，也有感慨在遊走。對於1970年代後期出生的某些讀者而言，《白鹿原》和《廢都》無疑還擔當了性啟蒙導師的角色。田小娥和黑娃，田小娥和鹿子霖之間的愛恨情仇，曾讓多少人感慨萬千。